

中国神秘文化

费秉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ZHONG GUO
SHEN MI WEN HUA

中国神秘文化

黄秉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神秘文化

费秉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 26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50

ISBN 7—5419—2095—9/Z·116

定 价：4.30元

13.9.20-13.20

92
K223
1
2

目 录

中国神秘文化	(1)
易卦占筮的哲理分析和价值评估	(9)
中国古典文艺与西方现代派	(21)
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	(40)
中国书法与舞蹈的美学比较	(64)
衰世悲剧的艺术折光	(71)
戏曲写意性的历史分析和未来设想	(83)
西部精神的历史根源	(92)
敦煌壁画与古代舞蹈	(99)
中国艺术的根本出路	(123)
宋舞与中国文艺的历史大潮	(132)
中国古代舞蹈的文化整合	(145)
论太古神话的悲剧精神	(158)
鼓中所沉积的古代宗教意识	(166)
楚舞与荆楚文化	(174)
论中国广场艺术的形成和发展	(184)
《舞赋》的美学思想	(193)
汉代文化与舞蹈	(201)
关于戏曲发展命运的思考	(216)
论《孔雀东南飞》	(229)
附录	(247)

B

998862

1

《搜神记》悲剧小说探微	(260)
论元代悲剧	(276)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303)
后 记	(329)

中国神秘文化

中国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在学术界差不多已形成热潮，这是我国开放之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全民族对于自身及其前途的一种内视思考，孕含着真诚的检讨和奋进的企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研究却带着很大的浮泛性和残缺性。除了民俗和各种掌故而外，其视野基本局限于儒、释、道等上层思想文化学派，同时把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往往也过于沾着，因而显出浮躁气。一方面急于在中西比较中给中国文化下各种概括性的结论，无心作深入具体的研究；一方面局限于上层文化，对势力很大实际笼盖全民文化意识的下层文化则很少问津，因而不能如实完整地反映中国文化最本质的精神特征。

有一类源远流长而深入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如卜筮、星命、堪舆、占候、气功、相学及符篆、禁咒等各种巫术，深深渗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力地影响着全民的文化心理，至今仍然在各个文化层次的国人深层意识中发生作用。这类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沉积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我们称之为“中国神秘文化”，如果稍加思索，你将不难承认，中国的宗教、民俗、艺术、古代科技（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算学、乐律、军事学等）、衣食住行、娱乐、婚配、生育、生产活动等等，无不与中国神秘文化发生关系。这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科学与迷信相纠合，大部分还是未被认识的领域，很难依凭人们的一般认识和科学知识进行解释。

中国神秘文化的不同门类中，科学与迷信的比率多寡不齐，有些门类中已经引出了具有极高应用价值的成果，而对它们的理

论把握却还停留在必然王国，企图在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对其中的科学成分进行真正的、明晰的剥离，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医实质也属于中国神秘文化，但由于它的应用价值显示得很早很大，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历史地位，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把它从神秘文化中划出来，实际上中医的高层理论和易占完全是一个体系。气功近年来发展很猛，在全国已蔚为大观，国际上已引起了影响。这两个门类，特别是中医，古代有丰富的理论著作，这种理论与西方实证科学毫不搭界，亟待沟通。另如特异功能，古书中的记载极多，这多年发现禀有这种特性的人所在多有，究竟是真是伪，对垒的两派文章都说得振振有词，但都由于缺乏细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检测依据，加上带着成见和意气，因此形同吵架。在理论体系方面哲理性和严秘性几乎可与中医伦比的易占，其理论构架气象博大恢宏，带有超高层性，但有不少环节却是缺乏实证的虚幻冥证。易占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无异于天书，对它的文化依托、哲理构架、各个环节，都需要进行新型研究，发掘其中宝贵的文化价值，批判谬误，引向应用，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又如风水这个门类，其中的科学成分渐渐被人们所承认；有些门类如辟谷服食、望气等，前多年基本判为迷信，但近年人体科学的实践已证明古书中的这类记载和民间某些说法，并非全系无知妄说，完全以迷信和伪科学判之，是轻率的、简单化的作法。至于禁咒、符篆、厌胜、扶乩等巫术，以目前的认识看，基本成分属于迷信，但它们既然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都是文化学不可回避的课题，因为这些文化现象是探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思维特征、遗传基因、集体潜意识等的主要依据，无视它们回避它们，显然不是文化研究的严肃科学的态度。诸如以上各个门类，都是中国神秘文化研究的对象，虽然它们之间可能有轻重缓急之别，但不应有哪个方面成为禁区。

毋庸讳言，中国神秘文化研究，大部分在半个世纪以来已处于休歇、禁绝、遗忘、断裂的状态。老一代具备这方面知识素养

的人大多已经谢世，年轻一代对此则所知甚少，现在要开始这方面的研究，首要的是先把这一笔遗产传承下来，从逐步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到较系统地掌握神秘文化的内容和古代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以现代人所具备的丰富知识和新型的理论武器对中国神秘文化的总体系和各门类进行分析研究和理论抽象。在中国神秘文化研究这个大领域中逐渐发展出各种分支学科包括一些应用学科。这些学科，有的带有很大的综合性，有的则比较专门化。这些学科将与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军事学、各种自然科学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神秘文化丛书”就是中国神秘文化研究最初步的工作，选题大多是一些具体门类。撰写这套丛书的要求是，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清新朴实的述写形式，对所选专题进行尽可能全面深入的论述。书的结构体例、述写风格不求统一，撰著者可以有很大的自由，但每书大体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对论述对象（1）追溯其源头；（2）描述其历史展过程；（3）简要陈述其基本内容，并对之进行理论分析；（4）进行价值评估和前景展望（这四点不应成为全书的结构公式）。对这套丛书来说，其科学性主要应体现在对所写对象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论析，不强做简单生硬的批判，也不做盲目的肯定，要避免离开扎实分析的无说服力的空洞褒贬，从而使读者对神秘文化各门类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对其性质、起源、发展沿革、基本内容、历史实践状况等有比较具体的了解。

这套丛书的撰稿者，大多是近八九年来读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文史工作的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学者，一般都能阅读有关古籍。选择这样一批人，是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而又不泥古，有较新的知识结构，思想不封闭，视野较为开阔。我们想使这套丛书成为继承中华文化遗产的书，研究的书，启蒙的书。希望它们的出版能有助于开发民智，导向科学之路，而使封建迷信现出丑陋的面目；也想使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在现代文化氛围中开放世

界性的花朵。

这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下面我们重点谈谈人们很感兴趣的易卦占筮问题。

中国占筮的本质根源无疑是巫术，但占筮却已挣脱了巫术，或者说它是巫术文化的理性化发展。它和巫术的相同之点是冀求解决依凭正常实践不能把握的机遇、命运、吉凶祸福诸问题；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易”的构建，占筮越来越表现出和一般巫术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即巫术是一种带有神话性和戏剧性的感情发泄的行为，巫术的施行者都程度不等地处于某种迷狂状态，依靠其行为动作，诉诸人们的心理反应，以达到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占筮在它的初期可能尚有着与巫术较多的共同点，而越到后来则越成为冷静的数理推衍，成为根据严密的逻辑和复杂的联系性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和把握。它所尊崇的不是某种人格化的神奇力量，而是自然的数理规律；但是卜筮中的这种数理规律同社会人事中各种关系及性质间的沟通和关联，并不都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并不都是科学的。即使科学合理的成分，直至目前也还不能凭人们的一般认识和科学常识进行透彻而服人的解释。

从历史记载和文物来看，我国在殷商时代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卜筮制度。本世纪初以来，在河南安阳的殷都故址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卜骨和卜甲，就是殷商时代占卜的遗物。这些卜骨和卜甲上，有钻灼后出现的兆纹，有的还刻有卜辞。所谓卜筮包括两种类型，这就是“卜”和“筮”。“卜”指钻灼龟甲兽骨观察兆纹以定吉凶；“筮”指用蓍草衍卦以占吉凶。从《尚书·洪范》记载商代旧臣箕子的话知道，殷商时代国家立有专门进行卜筮的“卜筮人”《周礼》也载有朝廷设立大卜二人、卜师四人、卜人占人筮人各八员的制度。国王要决定国家大事，首先自己作慎重考虑，再和卿士商量，和庶民商量，并通过卜筮以决疑难。从箕子所说的决策参考依据看，卜筮比人的意见更为重要。其中大致

有六种情况：①国王、龟、筮、卿士、庶民意见一致，称为“大同”，事情大吉大利。②龟、筮和国王的主张一致，而卿士、庶民都反对，就照国王的主张行事，也是吉祥。③龟、筮、卿士赞同的事，王和庶民反对，即按龟、筮所占行事，也为吉利。④龟、筮、庶民赞同的事，王和卿士反对，按龟筮所占行事，仍为吉利。⑤王与龟卜一致，卿士、庶民反对，占筮与卿士、庶民意见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祭祀等事可行，外部征伐等大事则不宜行动。⑥王、卿士、庶民一致同意的事，龟卜、占筮都不吉利，则不能行动，行动为凶。

先秦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卜筮的记载。《诗经》中的《绵》是周人陈述他们的祖先古公亶父率领部族迁移择居的史诗，其中写到当他们来到周原这片肥美的土地时，“爰始爰谋，爰契爰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经过龟卜，卜兆指示，就在这里筑室定居，大吉大利。《诗经》的《文王有声》中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记载周武王定都镐京时也用龟卜。周部族创业时，一些重大的人事抉择也是和占卜有关的。有一天，周文王要去打猎，首先进行占卜，其结论是今天将要有重大收获，但不是熊黑虎豹之类的猎物，而是上天赐给的一个辅佐他的重要人物。据说夏禹畋猎时得到皋陶，其卜兆就和这天的兆纹非常相象。果然出猎到磻溪时，遇到了已经八十岁的吕尚，经过谈话，感到确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文王非常高兴，对吕尚说：

“我的先君太公曾说，要有圣人出来兴周，这个人就是您啊！我的太公早就盼望您了！”于是就把吕尚的号称为“太公望”，让他和自己乘坐一个车子回去，拜为国师。这都说明周人和殷人一样，对卜筮是很重视的。

周代的卜筮有一系列规定，如《礼记·曲礼》谈卜筮的时间时说：“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就是郊外之事用奇日一、三、五、七、九（甲、丙、戊、庚、壬），郊内之事用偶日二、四、六、八、十（乙、丁、己、辛、癸）。卜日的规矩是，丧事

先就远日卜，吉事先就近日卜。所谓就远日卜，如本月下旬先卜来月下旬，来月下旬不吉，再卜来月中旬；下中旬皆不吉，然后卜来月上旬；就近日卜，即在最近日中卜求吉日，近日无吉日，再由近及远求之。又有“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等规矩。所谓“卜筮不过三”即占卜一次仍有疑，可占二次，二次还不能决定，可以占第三次，但须就此终止，否则就是一种褻渎行为。所谓“卜筮不相袭”，是对卜和筮的关系的规定，即龟卜不吉，不能再行占筮；占筮不吉，也不能再用龟卜。《周礼》等书又有“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先筮而后卜”的说法。显然，卜比筮更受到重视，即所谓“筮短龟长”，“筮轻龟重”。这一系列讲究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说明有些规定在后来被逐渐推翻或做了新的修正。当政者对卜筮往往并不拘泥陈规，特别是一些英明有识的君相，有了重大的政治或军事抉择后，主意坚定，根本不管什么卜筮的吉凶。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殷商的第二十王盘庚打定主意要把国都从山东曲阜一带西渡黄河迁到河南的殷地，遭到苟安的东方大奴隶主的反对，他们放出流言，煽惑民众反对迁都，其中所持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攻击盘庚刚愎自用，不遵古制，不用龟卜。又如，武王伐纣时卜筮的结论是“大凶”，姜太公推开筮草踏碎龟甲说：“桔骨死草，知道什么吉凶！”东汉的王充说，蓍筮龟卜，就象圣王的统治天下，卜筮的兆数恰如明君治世时出现的瑞应，其实都是一种偶然。瑞应无常，兆数诡异。对诡异的兆数，占者感到惶惑；无常的瑞应，引起人们的疑虑。武王伐纣时曾出现乌鱼之瑞，但是卜筮却是大凶，这两者就是矛盾的。如果说武王不该伐纣，就不应出现瑞应；如果说他应当伐纣，就不应出现凶卜。由此看来，卜筮是不可信的。

由于卜筮有着卜问神意的宗教神秘意义，所以卜筮所用的蓍草和龟也被神秘化。如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蓍草生长到一百年才会长出百茎，蓍草长到百茎，上边便会有云气覆盖，下边便会有神龟守护。又据说占卜时的用龟，天子一尺二寸，诸侯

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占筮所用蓍草，天子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如果从殷代算起，卜筮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深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全民中各层人的文化心理，直到现在及今后很长的时期内，都作用于各个文化层次的国民的深层文化意识。无视这种实际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绝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地认识它、研究它。中国几千年的卜筮史告诉我们，仅用“迷信”二字给卜筮下判语，是肤浅的、简单化的作法。毫不唐突地说，这是一种科学和巫术相渗透相融合的文化事实。即使象巫术、神话、宗教等，作为带普遍性的人类文化现象，尚且有必要深入研究，何况其中存在着科学成分的占筮，更应当提到我国文化研究的日程上来。当然，对占筮中巫术与科学的剥离，似乎不是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可以办到的事情；然而又必须承认，世界数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中国占筮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把握，将会日益成为现实，甚至会使它的科学应用价值放出惊人的光彩。对于文史工作者来说，第一步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卜筮的起源，它在古代的历史地位，演变发展过程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必须深入其中，摸清它的全部底细，包括它的具体内容和技术方法。

春秋时的占筮，主要是用《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和卦象推占吉凶。战国时产生了阐释《周易》经文的各篇传，这种阐发涉及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可以说是开放性的。到西汉，易学的地位大升，在两汉，易学成为显学。刘汉初兴，易学本由田何一人传承。按《汉书·儒林传》，他是孔子易学的第六代传人。

田何体系为今文《周易》；另有费直一系，不知传自何人，为古文《周易》。在西汉的易学派别中，焦延寿一派虽然出自孟喜，但多言灾异，走了另外一条路子。这一派传到京房，对占筮

灾异则踵事增华，所以《汉书·儒林传》记载刘向称易学“诸家大道略同，唯京氏为异党”。京房的易学著作达十余种之多，他创制纳甲之法，把五行引入筮法之中，使占筮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卦中分八宫，定“世”“应”，言飞伏，对后来的易卦占筮影响极为深远。其后魏晋时代的管辂、郭璞，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邵雍，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明清时代胡宏所著《黄金策》、程良玉所著《易冒》、野鹤老人所著《增删卜易》，纯以纳甲占卦，世应飞伏而外，对元辰、忌爻、旬空、月破、衰旺刑冲等多有发明，卦术至此，更加周密详备，其影响及于市井和乡村。近人研究易学的，只有尚秉和、高亨两家重视占筮，但两人的主张和研究侧重又有很大不同。高氏摒弃象数，只重筮辞；尚氏则极重易象，他研读《焦氏易林》几十年，从中发现了许多为汉魏人所不知的《周易》古象。尚氏又对邵雍的先天八卦说很表赞同，因此他在研究《周易》时兼及纳甲，又很重视河图洛书及先天八卦所包含的“数”，把它们用到对断卦的研究上来。

易卦占筮的哲理分析和价值评估

中国的“易”是一个囊括诸多学科的超高层学术领地，中国的哲学、宗教学、医学、数学、水文地质学、天文学、伦理学、美学等等，都可以在“易”中找到自己的源头。本世纪以来，《周易》已越来越在国际上显示出中国人的智慧光芒。时至今日，中国人应在这块特有的民族文化宝地中，开发出最有价值的宝藏。

占筮作为中国神秘文化一个重要门类，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它在中国从皇帝到奴隶中间包括文臣武将、读书人、隐居者、侠客、商贾、僧道、各类技艺人以及人口最多的广大农民的文化心理上，都或深或浅地刻上了印痕。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内，有一些人对此奉为圭臬；大多数人半信半疑；也有不少人占筮算命虽不大相信，但他们的文化心理却或深或浅地受着这种特有文化的影响。事实说明，即使到了科学技术在全球高度发展的今天，对占筮产生热情和兴趣的人，在中国仍然是不少的。因此对这种根子扎得很深的特殊文化现象，如果只是简单地反对人们参与它，或者仅仅空洞地用“迷信”二字去声讨它，其实并不能引出良好的社会效果。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并有一些研究者从理论、科技、应用等各种不同角度不断地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逐渐取得对它的科学认识，部分地揭示它的奥秘。当然可以断言，三四千年盘踞在中国国民生活和意识中的一个谜，绝不会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开。然而我们相信，破解这个谜的速度将会是越来越快了。

一、易卦占筮的哲理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易卦占筮的“易”，包括着殷周时期的《周易》经文、战国时期产生的易传和西汉以来的易学，它是贯彻中国整个古代历史的一门神秘复杂的学问，这门学问大体是在两汉时代构建完成的，两汉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却仍然有向深广的发展。汉唐以来，从“易”中引出的医学、算学等实用学科，表现了极大的活力，占筮在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也一直存在着、发展着。

虽然我们至今还不能对占筮的科学成份做出定性的判断，但占筮作为附丽于易学这门大学科的一个奇特的门类，从古人制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到占断凶吉的这整个过程，其大思路却颇具哲理意味和逻辑意味，能够给人以启发。这个思路最典型地代表着中国学术文化的诸多特征。

古人制卦，是对宇宙的一种总体把握和简化概括。天文、地理、社会，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被抽象为由阴阳两种爻画组成的八卦符号，虽然联系卦象和被占事物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并不一定具备实在的、必然的联系意义。郑玄所说的“易”的“三义”（“易简”、“变易”、“不易”）中的“易简”指的正是这种总体把握和简化概括。只有东方的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以简单的几种笔画对宇宙做出抽象概括，“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这种抽象概括，也并非始终目中无细物，而是宏观的细致观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并不死死地沾滞于物，而是很快地进入直观全体，把世界概括归纳为抽象的卦画符号。这种归纳过程同时就渗入了万物的形态、属性（阴阳五行）、时空（事物的存在形式四时和方位）和运动变化因素。“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

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种抽象概括同时还融进了数的关系，“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度，遂定天下之象”。这种数的融入，就给占筮中的易数推演埋下了伏笔。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系辞上》传对“易”作了高度的礼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也正因为概括归纳过程中渗入了这诸种因素，所以这种概括归纳的结果虽然极为简要，但却具有无所不包的品格。宇宙的万事万物都被囊括进这个坐标系中。陈梦雷说：“大抵易之未画，卦爻之变化在天地中；易之既画，天地万物之变化又在卦爻中。在天地者，未画之易；在易者，已画之天地。”认为易是宇宙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

这个图式中不但全体包含着部分，而且部分又包含着全体；世界由万事万物组成，而每一具体事物又反映着世界的大结构，即陈梦雷说的：“天地间凡物皆有乾坤，而人心尤自具一乾坤”，所以在这个宇宙图式中，每一具体事物的座标点不但可以寻绎，而对每一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又可据易的全局以进行。

如果说古人制卦成易是将宇宙概括归纳为一个座标图式的话，占筮则是在这个图式中寻绎万事万物的座标点，从而推断具体事物的位置、性量、前景、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易学认为，既然这个宇宙图式是囊括万有的，那么从这个图式中寻绎具体事物，考索它以往的运动轨迹和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就是可能的。用四十九策演卦，就以一种神秘的、带有偶然性的方式，把占算对象纳入卦中，然后再“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任何事物在这个图式中也难于逃遁，“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都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桥梁过渡到完全把握它的彼岸去。

那么，这种演绎过程是怎样呢？是以什么为线索和依据呢？大致说来，主要是根据占算对象的八卦归属，取对象所属卦的卦

象和卦辞进行占断；根据占算对象的爻位归属，分析其与他爻的乘、承、比、应关系，得位与否，并依据相应的爻辞进行判断；根据占算对象的五行归属，分析对象所属五行与日月、动爻五行的生克冲合比害等关系进行判断；根据主象爻所属六亲分析与有关爻六亲的关系以判断吉凶；根据对象所属易数推断有关数据……这样，事无大小，物无远近，都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在“易”的魔图上弄清它的底细。

《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陈梦雷《周易浅述》注解：“弥者弥缝，合万为一，使浑然而无欠；纶者丝纶，一中有万，使粲然而有条。弥而不纶则空疏无物；纶而不弥则判然不属。”“弥”、“纶”二字正好概括了古人制卦成易和后人用易占卦这两个过程。这是两个相逆的过程：制卦成易是古人观察宇宙万物，进行归纳、简化、抽象、“合万为一”的“弥”的过程；后人用易占筮，则是在易的宇宙图式上寻绎具体事物的条分缕析的演绎即“纶”的过程。易不是心造的幻影，它是以宇宙本体为基准的，所以无论“弥”还是“纶”，似乎都是不脱离宇宙万有的现实行为。

二、占筮的历史回顾

从历史记载看，自西周以来，占筮的地位是不断下降的。殷周时期，卜筮还是官方非常严肃的一项制度，如建都、出征、祭祀、选人诸大事，都要进行很正规的卜筮。到春秋时代，卜筮运用得更加广泛；纳妾生子之类私事也常常动用龟蓍。因为神圣的卜筮被用于占算个人私事，所以严肃性已被大大冲淡；但这显然是一个占筮大普及的时代。此时从事占筮的主要是太史，《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晋太史以乾宫八卦之爻变论龙的言论，可看出这些人对易卦已烂熟于心。在这个时代里，卜筮的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如主要以卜筮为职的晋国的卜偃，是属于大夫阶层的人